

多模态语篇视角下的中国抗战形象研究

——以《生活》(1936—1945)中的中国报道为中心

周思邑

(四川外国语大学 国际关系学院/研究生院,重庆 400031)

摘要:国家形象是主体间互动和认知的产物,媒体报道模态的选择与架构对国家形象塑造起着重要的作用。本文以系统功能语言学和认知语言学相关理论为背景,构建“现实-认知-模态”多模态语篇分析方法,从生产背景、意义建构和模态关系三个方面分析《生活》杂志中有关中国抗战报道的多模态特征,探析所建构的中国抗战形象。研究发现,相关报道多为互补和对比型模态关系,这种关系背后体现了意义建构的独特认知选择及其战争现实、文化和情景语境的生产背景。报道视角经历了从局外人同情到盟友共情的转变,在不同战争阶段突显了中国的灾难形象、坚强形象和盟友形象,影响了美国各界对中国抗战的关注和支持。

关键词:《生活》;中国;多模态;形象

中图分类号:H31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6414(2020)06-0091-09

0 引言

国家形象是一个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并不简单等同于国家的实际情况,而是可被塑造的(孙有中,2002:16),是主体间互动和认知的产物。中国国家形象的塑造与传播已成为一个具有战略意义的跨学科议题。多数研究重点考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尤其是21世纪以来的中国国家形象(程曼丽,2007;李安山,2008;蒋积伟,2019;刘玉梅等,2019),少有人关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中国抗战形象的塑造与传播。事实上,抗战时期美国主流媒体塑造的中国形象是历史上最成功的形象塑造之一,尤其是《生活》中有关中国抗战报道反映了美国主流媒体的中国观和战争观,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和研究价值。本文以系统功能语言学和认知语言学相关理论为背景,结合国际关系、传播学相关概念,提出国家形象塑造与传播的多模态语篇分析框架,并以《生活》中有关中国抗战的相关报道为语料,旨在探究《生活》对中国抗战报道的多模态资源特征,以及《生活》通过多模态资源建构中国抗战的形象。

1 多模态与多模态语篇分析框架

多模态有两层含义。一方面指传递信息、表达意义中使用的语言模态资源和非语言模态资源,另一方面指以多模态资源为考察对象的研究路径,如多模态语篇分析、多模态交际、多模态语法及多模态互动(Li et al.,2019)。本文主要采用多模态语篇分析的路径,其主要代表为Kress和Van Leeuwen(1996,2001),O'Toole(2011),Forceville(1996)。他们以Halliday(1978)的社会符号理论和系统功能语法为基础,将语篇分析的对象从单模态扩展到多模态,认为社会符号资源与语言一样都具有系统性和多功能性,意义不仅通过语言符号来实现,还会借助图像、图表等社会视觉符号资源的协同作用来实现。Kress和Van Leeuwen(1996,2001)提出以图像的再现意义、互动意义和构图意义为核心内容的视觉语法分析框架。多模态语篇除文字之外,还带有图像、图表等符号话语,或由任何一种以上符号编码实现意义的语

收稿日期:2020-07-17

基金项目:重庆市社会科学规划项目“亨利·卢斯《生活》杂志中战时重庆图像研究”(2016YBLS157)、四川外国语大学“认知语言学本土化研究科研创新团队”和四川外国语大学校级科研项目“美国《生活》中的战时重庆形象研究”(SISU201625)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周思邑,女,四川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讲师,博士生,主要从事认知语言学、政治话语研究。

篇。多模态语篇分析很快受到国内功能语言学派学者的关注(朱永生,2007;胡壮麟,2007;张德禄,2012,2019等),例如张德禄(2012:347)建构了多模态话语分析理论框架,主张从文化、语境、内容和表达四个层面开展多模态语篇分析。他进一步指出(张德禄,2019:68),语篇设计者在情景语境和文化语境组成的意义系统中选择合适供用特征的符号,建构融合为一体的多模态语篇。多模态语篇分析主要研究模态供用特征、协同作用和意义建构,以系统功能语言学为视角的多模态语篇分析长于多模态符号资源的社会因素,考察文化语境、谋篇方式、符号关系等方面,并取得了不少成果,但关注多模态资源选择的认知因素研究较少。兴起于第二代认知科学的认知语言学与功能语言学之间存在互补关系(Langacker,2000:261;胡壮麟,1991;王寅,2007),这给多模态语篇分析提供了新思路(田海龙等,2019;刘玉梅等,2020)。语言是系统地根植于人类一般经验和认知方式中的,它们在意义建构中起着重要的作用(Lakoff et al.,1980,1999;Evans et al.,2006;Ungerer et al.,2008;王寅,2007;刘玉梅,2013a),那么与语言具有同等重要地位的模态资源也是系统地根植于人类一般经验和认知方式中的。随着社会符号资源的发展,人们往往运用多模态资源来塑造和传播国家、社会、组织或个人的形象。笔者基于王寅(2014:62)提出的体认互动观,将其“现实-认知-语言”发展为“现实-认知-模态”,建构三维互动的多模态语篇分析框架来解释形象塑造背后的模态关系、认知选择和现实背景。笔者认为,形象的塑造由多模态语篇来完成,而后者是人们以现实互动体验和认知加工为基础对模态资源(语言模态和非语言模态)动态选择的结果;反过来,多模态语篇所塑造的形象又会反作用于模态、认知和现实互动。简言之,多模态语篇的形成和发展依循“现实-认知-模态”这一基本原理,而形象塑造则是这一互动过程的产物(如下图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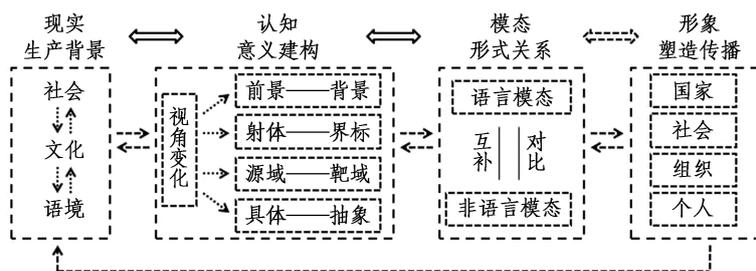


图1 多模态语篇分析框架

图1表明,基于现实背景和认知选择的语言和非语言模态资源在形象塑造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在宏观层次上,用实线双向箭头体现“现实-认知-模态”互动过程,用虚线双向箭头体现三者互动与形象塑造之间的关系;在微观层次上,现实、认知、模态和形象塑造包含不同的参数和内容,我们用单项箭头表示其作用与反作用关系。具体而言,现实生产背景包括社会互动现实、文化背景和情景语境。比如在国际关系中,行为体互动体现为战争与和平、冲突与合作等。以战争为例,战争互动包含战争不同阶段的各方行为。文化背景包括人的思维模式、处世哲学、生活习惯,以及社会意识形态等(张德禄,2012:348)。情景语境指话语范围、话语基调和话语方式所决定的语境因素,还与交际者的交际对象和交际目的密切联系。在认知层面,意义建构与认知视角化相关,认知视角是基于现实互动的观察角度安排,其变化会引起认知参数的变化和相应的模态关系变化,如影响前景与背景、射体与界标、源域与靶域、具体与抽象等认知参数的变化。由于人类具有确定注意力方向和调整焦点的认知能力(Langacker,1987,2008;刘玉梅,2013b,2014;王天翼等,2015),设计者会基于与社会、文化和情景语境的互动体验来确定视角,选择部分事物作为前景得以突显,而未选择部分作为背景来衬托前景。在前景中,各部分突显程度不同,最突出的成为射体,其他部分成为界标。认知视角还影响另一重要认知参数——隐喻,在多模态隐喻中,源域和靶域常分别由不同符号呈现(Forceville et al.,2009;Yus,2009;Sobrinho,2017;潘艳艳,2011;冯德正,2011)。多模态隐喻映射既反映社会和心理现实,又重新建构现实(Lakoff et al.,1980,1999;王寅,2007)。此外,设计立足视角选取部分情况进行详细具体扫描,未选取部分做一般扫描。视角、突显、隐喻和详略度等认知操作传播报道者的态度、感受、立场和价值观等,为最终形象的模态化做铺垫(Haarman et al.,2009;刘

玉梅等,2019:71)。在模态层面,基于现实的认知建构影响模态选择,有些可能用语言(文字和数据等)模态来表达实现对事件的认识,有些用非语言(图像、排版和颜色等)模态来实现,例如大写、加粗等排版模态从视觉显著性体现了认知突显性(Nørgaard,2019)。多模态语篇中,认知选择突显的前景模态一般篇幅较大,位置居上,常选用直观清晰的图像模态实现,相对而言背景较小,居下,常通过语言模态补充语篇背景,同时,为传播隐匿的价值倾向,模态中常含有对比特征,因此,模态关系多体现为互补或对比,模态协同表达语篇意义。多模态语篇意义既来源于社会和文化语境,同样根植于人类的互动体验和认知操作中,并通过语言和非语言模态体现出来,展现立体多维的目标形象,成功塑造的形象将反作用于现实活动,形成新的循环互动。

如下面的图2,编者基于1937年8月28日日本对上海南站实施无差别轰炸的战争现实背景,在认知视角的选择上形成了独特的前景-背景关系及其对应的图文模态关系,即突显华人摄影师王小亭拍摄的上海南站图像,将其设置为前景,占了近一个版面,文字则作为背景补充对事件的说明。编者基于认知视角将前景中的婴童突显,界定为射体,被轰炸后破败不堪的上海南站则作为界标,由此形成射体和界标关系。同时,被置于舞台中央的射体,衣衫破烂、血迹斑斑、号啕大哭的婴童又带给读者无限联想,唤起源域,转喻了战争中无数失去亲人的孤儿,整个射体-界标关系则突显了日军对非战平民区实施无差别轰炸的残忍和战争带给民众的苦难。在前景-背景关系中,作为背景的文字,虽只有几行,但也体现了编者的认知视角,譬如采用“形式越多内容越多”的隐喻(Lakoff et al.,1980:127),用“136,000,000”而非“136 million”来突显观看到这个情景的人数之多,详述数据表明其影响力巨大。互补型图文报道塑造了日军的残暴形象和中国民众的苦难形象,激发了读者的同情心,促进了美国民众对中国的抗战援助。

2 《生活》对中国抗战报道的多模态特征分析

《生活》1936年由《时代》之父亨利·卢斯创刊,并以“看生活,看世界”为创刊词。该杂志通过富含图像、文字和色彩的多模态图文故事(Picture Story)来传达信息,表达意义,图文并茂、通俗易懂的方式跨越了阶级、宗教、种族、地域以及政见的不同,风靡无数东西方家庭(布林克利,2011:178),成为抗战时期拥有最广泛读者的杂志之一。然而,学界对《生活》的研究较少,因此,本节从多模态关系特征、多模态特征的认知意义建构和多模态特征的现实生产背景三方面分析《生活》对中国抗战报道的多模态特征。

2.1 抗战报道的多模态关系特征:模态互补和对比

中国是《生活》抗战时期报道的一大重要话题领域,笔者(2019:107)以1936年杂志创刊为起点,至1945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抗日战争胜利这一年截止,统计出475期《生活》中含对华报道198篇,共计690页,1731张图片,平均每篇报道约8.8张图片,每页约2.5张图片。从时间来看,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经历了抗战防御阶段(1937—1938)、抗战相持阶段(1938—1943)和战略反攻阶段(1944—1945)三个阶段(张宪文等,2017)。在抗战相持阶段后期,《生活》更加聚焦中国抗战,报道数量增加。从内容来看,《生活》每周有一些固定栏目,如细说图片、海外掠影、专题报道和社论等。《生活》各个栏目都报道过中国抗战,内容多元,涉及政治、军事、文化、外交、社会各方面,是珍贵的抗战史料。

表1 1936—1945年《生活》的中国报道

年份	防御阶段			相持阶段					反攻阶段	
	1936	1937	1938	1939	1940	1941	1942	1943	1944	1945
篇数	2	25	26	15	15	34	28	22	16	15
总计	53			114					31	
占比	27%			57%					16%	

2.1.1 互补型模态关系

《生活》抗战报道的多模态关系特征主要体现为互补型,具体为补充和强化。补充关系指另一模态

补充主要模态的背景信息;强化关系指一种模态是最主要的交际形式,另一模态是对它的强化(张德禄,2012:344)。《生活》首篇一般为人物或事件报道,图片是最主要的交际模态,文字多为人物或事件图像的补充或强化。杂志末篇一般为社论文章,为增加趣味性和盈利性,一般10页左右的社论文章中穿插3-4页广告图片和数量不等的摄影照片。在字数较多、篇幅较长的社论中,文字是最主要的交际形式,摄影则强化人物信息或观点。《生活》摒弃了照片仅作为画意体现和简单记录的方式,首次把照片提升到文化语境中,与文字相互协同形成连贯有深度的故事,从而建构生动形象。

在人物或事件报道中,图片一般左右或上下排版,有时还选取一些摄影特写为前景,或突显该人物或事件的重要性,或转喻同类群体,文字则补充人物或事件背景。如《4000重庆居民在防空洞窒息》选取四张摄影为前景,展现了“六五”隧道大惨案中尸体累累的惨剧,少量文字补充背景:

(1) On June 5, Japanese bombers sent 5 000 Chungking civilians into their biggest air-raid shelter, a mile-and-a-half-long tunnel...Bodies pile up faster than trucks can carry them off to mass grave outside the city. It took two days to remove the dead...Husbands, wives and babies died together in the Chungking air-raid shelter, locked in for five hours of Japanese bombing...^①

报道中,四张照片占据绝大部分版面,标题下方和图片下方几行文字补充惨剧发生的背景:时间、地点、原因和后果。背景文本中,句首几个词加粗突显,如“Husbands, wives and babies”转喻大量同类群体,引起读者共情。社论中的文字是最主要的交际形式,图片则强化人物形象或观点。在《关于中国的警告》的四页社论中文字是主要模态,而赛珍珠伏案书写的照片则强化作者信息。



图2 136,000,000人看到上海南站图像



图5 颜色模态



图3 中国人和日本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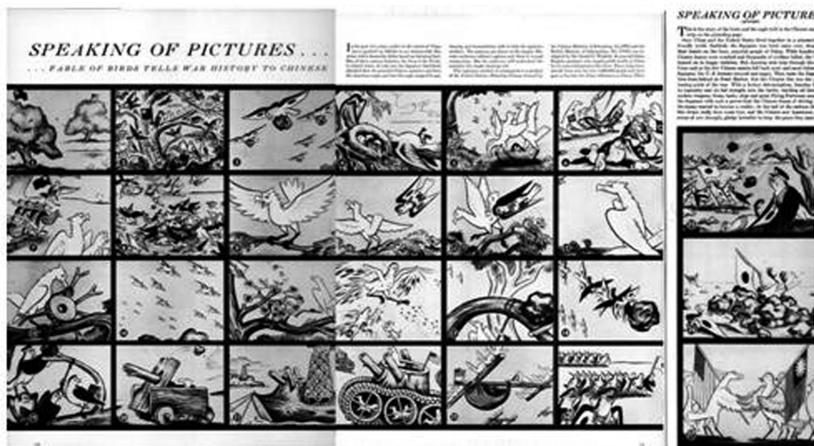


图4 鸟儿述说中国战事

① 图略,文中语料来自1936—1945年《生活》报道。

2.1.2 对比型模态关系

在互补型特征基础上,《生活》报道的另一类模态关系为对比型,例如,1937年10月4日海外掠影中,大量图片展示了上海、天津、北京和沧州被日军轰炸后的惨剧,但编者选取了一些照片以乐观对比死亡,如失去左臂的男子面对镜头微笑的照片和轰炸后的残垣废墟图像形成对比,图像下方文字中,胜利的微笑(A winning smile)置于句首加粗前景化,对比突显了乐观与坚强。

(2) A winning smile breaks on this citizen's face in a Shanghai hospital, despite the recent loss of his left arm.

对比型模态关系与互补型模态关系常交织在一起,多模态关系特征表现为图图对比、图文互补和图文对比等。如图3,编者首先并置图片形成图图对比,图像与图内文字和图下文字相互补充,互补的图文整体间形成对比关系。

图3用年轻挺拔的中国人和年长矮胖的日本人图像及文字进行对比,对比型图文关系暗含编者的价值取向,具有语用“附加值”,使读者在观看中识解编者的价值倾向,达到编者的感性和说服力目的。

总体而言,互补型模态关系是基础,《生活》用图片或文字模态锚定事件,另一模态补充详略度,让读者不仅知道事件是什么,还告知为什么,以满足读者好奇心,增加杂志趣味度和思想性。对比型模态关系在互补型模态关系基础上,通过视觉反差,让读者识解编者蕴含的价值倾向。

2.2 抗战报道多模态特征的认知建构:借助不同的认知操作

抗战报道多模态特征的认知建构常借助于不同的认知操作,如认知视角,及其影响的前景与背景、射体和界标、源域和靶域、具体和抽象之间的设计,来表达对所观察现实的认识。图4《鸟儿述说中国战事》用27张序号相连的漫画图片讲述了中国的抗日战争史。

图4位于1944年7月24日《生活》首篇位置,借助于认知视角等认知操作建构意义。由于这则漫画故事的交际对象和交际目的是向目不识丁的观众普及战事,所以选取简单易懂的图片为前景,文字补充背景,战争后期美国的认知视角影响前景选择,将威武挺拔的白头鹰突显成为射体,隐喻强大的美国,相对而言,体型较小的麻雀和乌鸦成为界标。

表2 《鸟儿述说中国战事》中的部分隐转喻

源域	靶域	隐转喻
麻雀	中国人	隐喻
太阳图样	日本	转喻
乌鸦	日本人	隐喻
白头鹰	美国人	隐喻
石头	武器	转喻
投石	轰炸和战斗	隐喻
乌鸦冲撞老鹰	珍珠港事件	隐喻

多模态隐喻研究离不开转喻(Forceville et al., 2009:12),转喻和隐喻共同建构意义。乌鸦翅膀带有太阳图样,转喻日本。麻雀们在贴着“把敌人赶出去”标语的大树上开会、搬运石头,隐喻中国反抗日本侵略的全民族战争。乌鸦大量抛运石头,隐喻日军对华无差别轰炸。隐喻美国的白头鹰在另一棵树下跳舞,此后声援和救助麻雀。图4中的第10幅图是乌鸦撞击白头鹰,隐喻日本偷袭珍珠港,此后白头鹰直接参与战争,生产武器,白头鹰和麻雀共同作战,最终乌鸦战败,白头鹰与麻雀庆祝胜利。这则多模态报道中少量文字补充制作背景:

(3) The cartoons are shown to the largely illiterate audiences without captions and there is no oral commentary. But the audiences still understand the narrative the simple drawings tell. This ingenious method of propaganda is a product of the United Nations Filmstrip Library, formed by the Chinese Ministry of Education, the OWI and the British Ministry of Information... These strips have gone as far into the Asian wilderness as Lhasa, Tibet.

报道中的多模态隐喻受文化因素影响。在美国文化中,白头鹰是自由、勇敢和力量的象征,乌鸦则代表不祥和死亡,麻雀代表数量多和顽强。图片寓意了美国的军事重要性,中美同盟抗战,和平来之不易,战后国际社会应珍视和平。

2.3 抗战报道多模态特征的生产背景:现实、文化和语境因素

《生活》对中国多模态报道的生产机制受现实、文化和语境的深刻影响。战争是多模态报道的现实基础。战争不仅是一种政治行为,而且是一种真正的政治工具,是政治交往的继续,是政治交往通过另一种手段的实现(克劳塞维茨,1982:43)。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经历了抗战防御阶段、抗战相持阶段和战略反攻阶段三个阶段。在中国抗战中,美国根据战争情景和自身经历逐渐调整对中国的报道视角,选择合适的模态形式,协同建构多模态形象。

战争现实影响国家文化和个体文化。二战期间,美国经历了从孤立主义到英雄主义的转变,从个体文化看,《生活》主编卢斯、记者白修德、赛珍珠等深受中国文化影响,卢斯和赛珍珠作为传教士后代,在中国的童年经历更让其对中国抗战获得很高的关注度。《生活》中许多优秀的摄影师勇于探险,深入中国抗战最前线带来最鲜活的报道,如卡帕拍摄了汉口轰炸,迈当斯夫妇报道了重庆轰炸和四川小镇,瓦迪维持拍摄了遥远而富饶的新疆。洛恩加德(2006:1)对44位《生活》摄影师进行访谈后说:“我们所拥有的共性之一,就是我们都热衷于拍摄世界,尤其是人,而且我们每人都认为自己比其他人干得好。”

卢斯的《生活》与《时代》《财富》读者定位不同,语境不同。如果《时代》是为忙碌、有文化修养的人提供的一种新闻摘要,《财富》是为吸引生意人的兴趣创立起来的,那么《生活》从它诞生之日起就是面向所有人的杂志(艾伦·布林克利,2011:178)。《生活》是面向大众的读物,图片每个人都能欣赏,战争中动人心魄的画面更多。《生活》对中国抗战的多模态报道以焕然一新的摄影加深感观印象,用小说般的体裁叙述形式讲述极其复杂的事件,可读性和趣味性极强。“现实-认知-模态”相互影响,共同塑造不同时期的中国抗战形象。

3 抗战时期《生活》对中国报道形象建构

3.1 局外人的同情:中国的战争伤害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日本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攻势凶猛,中国政府呼吁国际社会支援中国抗战,然而,美国持观望态度,采取尽量不予卷入的态度。基于长期“重欧轻亚”政策,强大的孤立主义传统和对日贸易的庞大利益,美国虽谴责日本,但保持“中立”。在现实背景下,《生活》从局外人的视角审视中国的抗战,主要以快讯和摄影故事报道中国抗战,多选取图片为前景,突显战争伤害,文字和数据为背景,补充详略度。模态关系多为互补型,图像、颜色、文字和数据协同作用,塑造了中国的战争灾难形象。

《日本占领者带来南京“地狱”》中,南京大屠杀后城内狼藉、妻离子散、尸体累累的四张图像是前景,其中一张图片中央是放置在钢丝围栏上、血淋淋的头颅,它与围栏形成射体-界标关系,头颅转喻了南京大屠杀的无数伤亡,图像下方配上三行文字补充背景,中国头颅(Chinese head)两词置于句首加粗,互补型模态报道突显了屠杀的残酷性。《数百万中国难民转移长江上游》用近两个版面的摄影图片展现了大量难民乘坐舢板挤上游轮逃往长江中上游城市汉口和重庆的场景,左侧的文字(4)详述天气恶劣和疾病反复肆虐的背景,互补型图文报道突显了战争中民众的悲惨:

(4) Probably tens of millions of Chinese are now on the run... This winter they will be swept by plagues of smallpox, scarlet fever, measles, typhus, cerebrospinal meningitis, diphtheria and influenza. In the spring, cholera, typhoid fever, dysentery and malaria will return...

颜色模态突显了战争的动态性和残酷性。如图5,日本对汉口轰炸后的摄影图像为前景模态,一行文字补充背景:撤离政府的临时首都汉口贫民窟在日本轰炸后的红色大火和黑色烟雾。红与黑颜色对比鲜明(Kress et al., 2001),对比型颜色模态和互补型图文模态共同突显了战争的激烈性和破坏性。

在抗战初期,《生活》略带有局外人的审慎视角。如《中国人的残酷》中,报道用图文模态展现了残酷

的军阀战事,提及中国人性格是温顺与残酷的奇怪矛盾体,“STRANGEST”大写加粗置于句首,得到突显:

(5) STRANGEST paradox in Chinese character is its mixture of tenderness and cruelty.

《中国人观看汉口空战》用互补型图文模态报道了1938年汉口空战中大量中国群众观看中日飞机空中较量的事迹,报道从美国局外人视角突显了中国人对奇事的围观,选取的图像模态详细框定了民众从惊恐、欢乐到自豪的表情变化。抗战初期《生活》对中国的认知视角是较远的局外人视角,多模态报道突显了军阀内斗、好奇围观、疾病肆虐、尸横遍野等形象,同时,美国读者被大量灾难报道所震惊和动容,逐渐开始扭转孤立主义倾向。

3.2 旁观者的声援:中国的坚强抗战

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美国越来越意识到中国在战争中的作用,开始从自身安全的全球战略考虑,认识到中国抗战的意义具有全球反法西斯侵略的价值(罗宣,2005:178)。前期大量灾难报道逐渐改变了美国孤立主义倾向。现实背景影响了《生活》对中国抗战报道视角,声援中国的情感更加突出。报道选用正面词汇和图像让中国抗战的坚强形象前景化。模态关系既有互补型,也具有对比型。《生活》选用正面词语报道中国的“愈战愈强”,如用“抓不住(uncatchable)”描写中国人,用“不可战胜(unconquerable)”描写中国小镇。虽然经历战争灾难,但中国人民却坚强生活,坚持抗战。在《日本轰炸重庆,中国继续抗战》中,重庆被轰炸后建筑倒塌浓烟滚滚的摄影图片占两个版面,下方文字补充道:

(6) Since he and his government moved there in 1938, the city has boomed despite frequent bombings. Over 190 miles of new wide streets have been built. New buildings of stone have replaced the bombed wooden ones. In the suburbs small factories and arms works, hauled overland by the Chinese retreating from Shanghai to Nanking and from Nanking to Chungking, are in production. The population has risen to 420,000 people, 250,000 of whom are already safe from air attack in shelters that have been cut deep in underground rock. One rock shelter cuts under the main downtown section of the city for half a mile. While the Japanese raze the wooden surface of an old city, Chinese are busy putting up the stone framework of a new city.

报道中,图像为前景居上,文字为背景居下,文字和数据增加详略度。四组词语形成射体与界标关系,如“崭新”(new)和“破旧”(old),“岩石”(stone, rock)和“木质”(wooden),“建造”(put up)和“摧毁”(raze),“框架”(framework)和“表面”(surface)。射体置于句首突显,与界标形成对比反差,崭新、岩石、建造、框架词语突显了坚硬顽强,建构了中国人民在战争中勇敢乐观和充满生命力的形象。

《生活照旧:人们笑对死亡》中,20张图片是报道前景,少量文字补充背景。前景中,新式运动和残垣断壁形成射体-界标关系,射体突显了生命力和活力,对比型模态关系塑造了中国人坚强生活的形象。这一阶段,互补型和对比型模态关系塑造了中国人民面对物资匮乏、无差别轰炸和疾病肆虐,坚强抗战和积极生活的形象。大量美国民众通过《生活》了解中国的坚强抗战,并筹集资金援助中国,30年代末美国成立了八个救济中国的人道主义机构,1941年2月卢斯协调各机构成立美国联合援华会(United China Relief),以更多的报道和资金筹集活动支援中国。

3.3 盟友的共情:中美的同盟抗战

1941年珍珠港事件后,美国改变了一百多年来的孤立主义,加入反法西斯同盟。1941年《生活》主编卢斯来华,在重庆和潼关前线近距离感受了抗战生活,多元互动现实使这一年《生活》对中国报道数量达顶峰。《生活》从盟友视角对中国进行多模态报道,常采用图片模态激活读者的认知判断和比较,文字模态详述背景,对比型模态关系塑造了具有价值倾向的形象,加深读者与编者的价值认同感。

1941年12月7日珍珠港事件爆发,美国宣布加入反法西斯同盟,12月22日《生活》随即刊登了《如何区分中国人和日本人》。在认知建构上,盟友认知视角影响了前景-背景设置,报道选取了中国经济部部长和日本首相图像(图略)以及中国兄弟与日本军人图像(图3)形成对比型前景,图像内文字以及图下文字补充背景。《生活》同时用温文尔雅的中国官员和年轻挺拔的中国兄弟转喻中国人,严酷冷峻的日本首相和年长矮胖的日本军人转喻日本人,图像直观,对比性图像形成强烈反差,突显了中国人更挺拔清

秀,更符合西方人审美观;其次,文字增加详略度,详述了中国人和日本人的体貌区别,在词语选择上,《生活》毫不吝啬地正面详述盟友中国人的体貌,如高、瘦、清秀、理性、宽容,而对于日本人,则更多地选用矮、胖、扁平和无情等。从模态形式看,图图对比、图文互补和图文对比形成的复合型多模态报道建构了中国人的友好形象,唤起了西方读者的认同和支持。

彩色封底广告是《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1943年11月22日封底广告“Have a Coke”从盟友视角出发,选取中美战士碰杯可口可乐的彩色图片居中作为前景,少量文字居下补充背景,可口可乐图标位于右下角,标题文字突显了中美友好主题:

(7) Have a “Coke” = Good winds have blown you here, a way to say “we are friends” to the Chinese.

图片前景中,中美战士帅气挺拔,服饰整洁,面带微笑,碰杯饮品可口可乐,美好的外形和同样的生活方式激活了读者对中国战士的认同,广告图片触动无数西方读者,让“中国朋友”形象深入人心。《生活》通过海报和报道让美国民众了解中国的抗战贡献,美国各界纷纷支援中国盟友的抗战。

因此,在抗战不同阶段,受战争现实、美国文化和读者语境影响,《生活》认知视角经历了从局外人到盟友的动态转变,运用“前景-背景”、“射体-界标”和“源域-靶域”等认知参数,选择合适的模态形式协同表达意义,其中,图像模态和文字模态互补是最主要的组合方式,此外,排版和颜色等非语言模态和语言模态互补或对比,共同发挥作用,在战争不同阶段突显了中国的灾难形象、坚强形象和盟友形象,影响了美国各界对中国抗战的关注和支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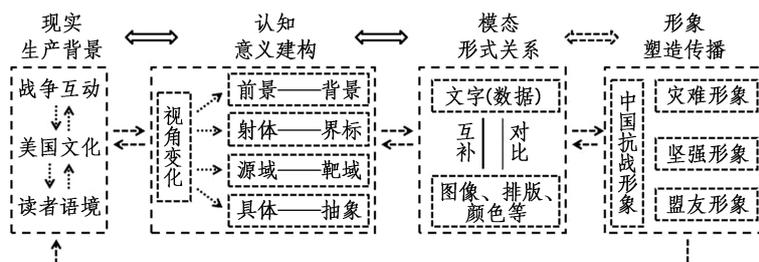


图6 多模态语篇塑造的中国抗战形象

4 结语

中国的抗日战争是全中国人民共有的抗战记忆,也是和原同盟国共享的反法西斯抗战记忆。在抗战各阶段,基于现实、文化和语境的认知建构影响不同的模态选择和组合,建构了历经灾难、坚强抗战和同盟抗战的中国形象,塑造了美国大众的中国观和战争观。卡尔·迈当斯在他自己为《生活》杂志拍照期间的回忆录中写道:“美国曾经影响了我们,每一周我们又影响着美国。”(布林克利,2011:199)通过198篇多模态报道,《生活》从西方独特视角展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东方主战场,告诉了美国 and 全世界读者战争的伤害性和残酷性,以及中国人民对抗战的贡献。

参考文献:

Evans, V. & M. Green, 2006. *Cognitive Linguistics an Introduction* [M].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Forceville, C. J. 1996. *Pictorial Metaphor in Advertising* [M]. London: Routledge.
 Forceville, C. J. & E. Urios-Aparisi, 2009. *Multimodal Metaphor* [G]. Berlin & New York: Mouton de Gruyter.
 Haarman, L. & L. Lombardo, 2009. *Evaluation and Stance in War News* [M]. London & New York: Continuum.
 Halliday, M. A. K. 1978. *Language as Social Semiotic* [M]. London: Edward Arnold.
 Kress, G. & T. v. Leeuwen, 1996. *Reading Images: the Grammar of Visual Design* [M].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Kress, G. & T. v. Leeuwen, 2001. *Multimodal Discourse: The Modes and Media of Contemporary Communication* [M]. London: Arnold.
 Lakoff, G. & M. Johnson, 1980. *Metaphors We Live by* [M].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Lakoff, G. & M. Johnson, 1999. *Philosophy in the Flesh* [M]. New York: Basic Books.

- Langacker, R. W. 2000. *Grammar and Conceptualization* [M]. Berlin: Mouton de Gruyter.
- Langacker, R. W. 2008. *Cognitive Grammar A Basic Introduction* [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Li, X. T. & T. Ono, 2019. *Multimodality in Chinese Interaction* [G]. Berlin & Boston: Mouton de Gruyter.
- Nørgaard, N. 2019. *Multimodal Stylistics of the Novel* [M]. New York & London: Routledge.
- O'Toole, M. 2011. *The Language of Displayed Art* [M]. London: Routledge.
- Sobrinho, P. P. 2017. *Multimodal Metaphor and Metonymy in Advertising* [M]. Amsterdam & 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 Ungerer, F. & H. -J. Schmid, 2008. *An Introduction to Cognitive Linguistics* [M]. Beijing: Pearson Education Limited.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 Yus, F. 2009. Visual Metaphor versus Verbal Metaphor: A Unified Account [G] // Forceville, C. J. & E. Urios-Aparisi, *Multimodal Metaphor*. Berlin & New York: Mouton de Gruyter, 147-172.
- 布林克利. 2011. 出版人亨利卢斯和他的美国世纪 [M]. 朱向阳, 丁昌建, 译. 北京: 法律出版社.
- 程曼丽. 2007. 大众传播与国家形象塑造 [J]. 国际新闻界(3): 5-10.
- 冯德正. 2011. 多模态隐喻的建构与分类——系统功能视角 [J]. 外语研究(1): 24-29.
- 胡壮麟. 1991. 功能主义纵横谈 [J]. 外国语(3): 3-11.
- 胡壮麟. 2007. 社会符号学研究中的多模态化 [J]. 语言教学与研究(1): 1-10.
- 蒋积伟. 2019. 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形象的历史变迁 [J]. 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1): 46-54.
- 克劳塞维茨. 1982. 战争论: 第一卷 [M]. 第2版.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 李安山. 2008. 为中国正名: 中国的非洲战略与国家形象 [J]. 世界经济与政治(4): 6-15.
- 刘玉梅. 2013a. 后语哲视阈下“意义世界”的建构 [J]. 外国语文(1): 60-64.
- 刘玉梅. 2013b. 语式形成的多重传压机理 [J]. 中国外语(4): 35-44.
- 刘玉梅. 2014. 外来词语形成的认知机理 [J]. 现代外语(5): 597-607.
- 刘玉梅, 管邦妤. 2019. 英文报刊文化报道的事件化过程及文化形象塑造——以 China Daily 为例 [J]. 英语研究(2): 69-80.
- 刘玉梅, 周思邑. 2020. 模态互动研究的新进展 [J]. 外语电化教学(3): 106-109.
- 洛恩加德. 2006. 美国生活杂志摄影师访谈录 [M]. 徐家树, 译. 北京: 中国摄影出版社.
- 罗宣. 2005. 在梦想与现实之间——鲁斯与中国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 潘艳艳. 2011. 政治漫画中的多模态隐喻及身份构建 [J]. 外语研究(1): 11-15.
- 孙有中. 2002. 国家形象的内涵及其功能 [J]. 国际论坛(3): 14-21.
- 田海龙, 潘艳艳. 2019. 多模态话语分析: 理论探索与应用研究 [G]. 北京: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出版社.
- 王寅. 2007. 认知语言学 [M].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 王寅. 2014. 后现代哲学视野下的体认语言学 [J]. 外国语文(6): 61-67.
- 王天翼, 甘霖. 2015. 后现代哲学视野中的多模态认知研究 [J]. 外语学刊(4): 82-86.
- 张德禄, 胡瑞云. 2019. 多模态话语建构中的系统、选择与供用特征 [J]. 当代修辞学(5): 68-79.
- 张德禄. 2012. 语篇分析理论的发展及应用 [M].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 张宪文, 李继峰等. 2017. 中国抗日战争史 [M]. 北京: 化学工业出版社.
- 周思邑. 2019. 抗战时期美国《生活》对中国的图像报道及启示 [J]. 青年记者(10): 107-108.
- 朱永生. 2007. 多模态话语分析的理论基础与研究方法 [J]. 外语学刊(5): 83-85.

Chinese Image in WWII Analyze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ultimodal Context Based on Chinese Reports in *Life* (1936—1945)

ZHOU Siyi

Abstract: The national image is the product of actors' interaction and cognitive shaping. The choice and frame of media multimodalities are of great significance in shaping the national image. In a combined multimodal analyzing framework supported by systemic-functional linguistics and cognitive linguistics,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analyzes the reports of *Life* on China in the aspects of reality, cognition and modality, and construes the Chinese image in multimodal report of *Life*. The modalities used in *Life*'s reports are mostly represented as complementary and contrastive. Multimodal cognitive operations constructed meaning. The actors' interaction in war, culture and situational context influenced the production of reports. *Life*'s perspective on China displayed a shift from an outsider's sympathy to an ally's empathy, highlighting China's disaster image, strong resistance image, and ally image at different stages of war, attracted wide attention and support to China's Anti-Japanese War.

Key words: *Life*; China; multimodal; WWII

责任编辑: 路小明